

南京党史資料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
南 京 市 檔 案 局

19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南京党史资料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市档案局

19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武中奇
责任编辑：成东红

南京党史资料

(19)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南京市档案局

南京金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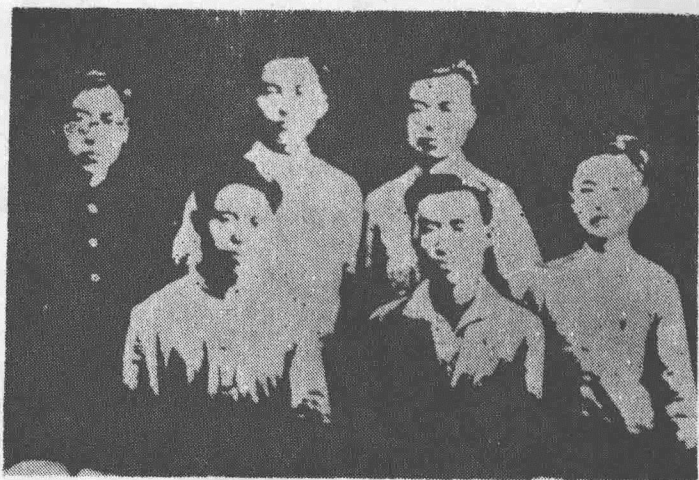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3/4 字数95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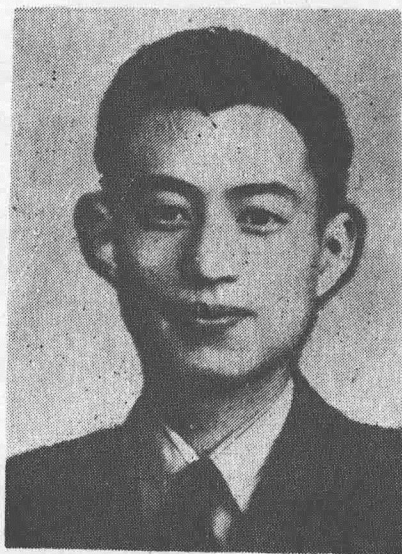
印数1—4,500册

报刊准印号：(JS)字第318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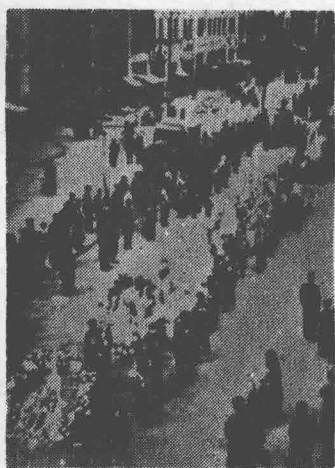
定价：0.90元



▲ 1929年石璞6人在南京合影。前排：左一陈景星（金陵大学党支部书记）、左二徐寿轩；后排：左一王大猷、左二郑辅周；左三明世勳；左四石璞。



▲ 1947年下半年成贻宾烈士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的照片。



▲ 为“四·一”死难烈士送殡的队伍经过南京市区。

目 录

专题综述

-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中学生党的工作回顾 盛天任 沙轶因 胡立峰 (1)

回 忆 录

广泛团结在助学的旗帜下

- 记南京中学生的几次助学运动 陶子平 (20)
- 把党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到群众中去 马兴业 (35)
- 市立师范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斗争 车助群 (42)
- 民主革命的春风吹进了教会学校 王珪珍 (49)
- 解放战争期间一中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陈志明 (52)
- 解放前中大附中党组织的活动 李桢革 (62)
- 市立一女中进步活动片断 张志明 (73)
- 青春的一页

- 记1948年前后在南京第四中学的一段学习战斗生活

-姚永年 (77)
- 李宗仁释放政治犯轶事
- 怀念杨兆龙同志.....陈修良 (82)
- 解放前夕南京《益世报》的版面斗争.....冯 正 (89)

缅怀先烈

- 恽代英同志在南京(之一).....吴玉璋 蒋燕萍 (103)
- 怀念成贻宾烈士.....彭毓芬 (112)
- 石璞烈士牺牲的前前后后.....张楚宝 (121)
- 火热的青春.....巫省三 (129)

文章评介

- 认识1928年南京政治经济形势的典范
- 介绍何孟雄的《反革命统治下的南京民众》一文
-奚金芳 (134)

其它

-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六合县的地下交通县
-中共六合县委党史办公室 (139)

解放战争时期

南京中学生党的工作回顾

盛天任 沙轶因 胡立峰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中学生党员队伍，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经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上，他们配合大专院校和其他系统的党员，开展了反蒋、反美、爱国民主的革命斗争，为解放南京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个时期中学生党的组织，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中学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抗战期间，我们党运用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合法形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击敌人，团结与发展进步力量。一些中学生在参加“清毒运动”和“学生互助会”、“干字实践会”的活动中，接触了地下党员，受到民主进步思想的启蒙，提高了觉悟，有的入了党，有的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

但是，在敌伪统治时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党的组织不可能有很大发展。加之当时中学较少，学生的流动性较大，因

此，到1945年夏抗战胜利时，南京中学生中只有12名党员，分布在当时的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模范男子中学、模范女子中学、国立师范学校、市立女子中学和私立汇文女子中学、中华女子中学、钟英中学这八所学校里。抗战胜利后，条件有利，又从进步学生中发展一批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中学生中发展的党员较多，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止，全市中学生党员累计有191名，先后分布在25所中学。南京全部公立中学、部分中等职业专科学校和较有影响的私立中学，大都有了党的支部或党员。

组织领导

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地下党还没有全市统一的领导组织。抗战胜利以后，属于华中局城工部系统的南京市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学生工作的领导，于1945年12月成立学生工作委员会，由欧阳仪、柯建平、盛天任组成，欧阳仪任书记；属于苏皖区党委系统的中学生党员，则由周兰、马凤楼等单线联系，分别由苏皖区党委派来负责南京工作的方休（化名王士林）领导。这时，钟英中学已建立了党支部，其它学校的党员少，采取个别联系。

1946年5月，根据华中分局决定建立了南京市委，统一领导原来各系统的党的工作。学委也作了调整加强，由市委委员王明远兼任书记，欧阳仪、盛天任为委员，学委下面先后联系过中学党员的有江瑾、徐漱华、马凤楼、王崇道、康景平、李辅仁等。

1947年“五·二〇”运动以后，大后方的学生党员关系转到南京市委，这年夏秋之间，学委领导又作了一次调整：由王明远、卫永清、盛天任、沙轶因四人组成，王明远为书记。学委下面分别设立大专、男中、女中三个分委。男中分委由盛天任兼任书记，委员有鲁平、胡立峰，另外有富继武和买德申为联络员（由盛天任联系，与鲁、胡平行）；女中分委由沙轶因兼任书记，以后有张锦屏、丁玉虹先后参加分委为委员。

1948年5月初，市委派王明远、胡立峰等到香港参加上海局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学习，当时决定由盛天任担任学委副书记，负责学委的工作。过了两个多月，王明远回宁后，盛天任仍然重点分管中学党的工作。同年12月，市委对学委领导又作了一次调整：市委委员王明远兼任文委书记，仍分管学委工作。卫永清经短期隐蔽后，调出学委，转任中学教委书记。学委由盛天任、沙轶因、饶展湘、胡立峰四人组成，盛天任为书记、沙轶因为副书记，中学党的工作改由沙轶因分管。鲁平另有任务，调出学委系统。男中分委由胡立峰、左士杰、王毅刚三人组成，胡立峰兼任书记；女中分委仍由沙轶因、张锦屏、丁玉虹三人组成，沙轶因兼任书记。1948年至1949年，先后有许家现、陆庆良、沈庆林、潘振玉、李时岳、袁旭霞、王庆淑担任过男中分委和女中分委的联络员。

学校基层，除钟英中学于1945年11月就建立了党支部外，1947年“五·二〇”前后，五中、六中、二中党支部相继建立。1948年秋至1949年初，又陆续建立了一中、三中、市立师范、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女中、二女中等校的党支部。

到1949年初，钟英、六中党员因毕业或撤退，留校人数骤减，支部不复存在。还有一些学校，始终没有建立支部，而由中学分委的同志与学校党员直接联系。南京解放时，全市有中学党支部8个，各校在校党员78人。

主要活动

从抗战胜利到南京解放的三年多时间里，党的中学生工作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到1946年底，我们利用当时国共和平谈判，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有利条件，在进步同学中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并且运用合法斗争的手段，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破除一部分同学对国民党的幻想，扩大进步力量，发展党员队伍。

刚刚胜利时，我们的党员数量很少，又很分散，在群众中的影响还比较小。在国民党政府和各学校当局的高压统治下，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秘密的读书会，传看进步的文艺、理论书籍和党的报刊，传播革命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团结、教育同学的工作，同时不失时机地发动和领导群众，同国民党作必要的斗争。

当时最反动的《救国日报》一连10多天发表总题为《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东西？》的反动社论，还一再污蔑谩骂在沦陷区读书的学生是“伪学生”，甚至骂住在沦陷区的群众是“伪百姓”。因此，钟英中学的党员和十几个积极分子就到《救国日

报》社去找社长龚德柏(绰号“龚大炮”)说理,虽然没有遇到本人,但是对该报起到了警告作用。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原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央大学及其附中和模范男中、模范女中、师范等学校,对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但没有妥善安置,反而规定要经过“甄别审查”,“合格”者才能分别进新成立的临时大学补习班和临时中学,这种歧视性措施引起广大同学的不满和气愤,地下党领导认为这是团结教育群众的好机会,应该因势利导地把同学们发动和组织起来,同国民党政府斗争,保护学生的读书权利。上级党要求这四所中学里的学生党员,发动同学和大学生配合进行反甄审斗争。这时虽然没有统一的党组织领导,但各校党员配合默契,经过几个学校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联络,以及大学生党员的帮助,10月成立了四所中学联合反甄审筹委会。先是,个别中学的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要求纠正“伪学生”一词,取消甄审,保证在校学生人人入学,教育部态度冷漠。以后,四所中学学生结队请愿,教育部仍不予答复,各校同学情绪日趋激昂。至此,四校反甄审筹委会决定动员同学罢考,并在考试那天派人在考场附近的各个路口劝阻同学进入考场,致使应考的人寥寥可数。

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对中學生实行镇压。上午先在考场附近抓走了几名劝阻同学应考的男女学生,下午又把正在开会的模范男中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全部抓走,使矛盾迅速激化。各校同学进一步激怒起来;而宪兵队审讯被捕同学后,又得不到“受人指使”的任何证据,不得不放人,教育部也只好把甄

审草草收场。后来，四所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参加过考试的，还是抵制考试的，全部被分发到三所临时中学。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原沦陷区人民不单在政治上歧视侮辱，在经济上也压榨掠夺。“法币”对伪储备券的不合理的兑换率，使原沦陷区的人民变得更加贫穷。许多学生家长为子女的学费发愁，人们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在增长。当时流行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绪。

1946年初的寒假，眼看有一些同学可能因无力交学费而失学。为了把众多的同学团结在身边，并适当减轻一些清寒同学的负担；为了让同学们走出家门、校门，接触社会，接受实际教育；也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这时刚成立不久的学委，布置钟英中学、汇文女中、市一女中和二临中等学校的党员，发动和组织各校同学，进行了一次以街头劝募为主要形式的清寒同学助学活动。

通过开展反甄审斗争和劝募助学金活动，四校在校同学全部入学并帮助一部分清寒同学解决缴不起学费的困难，同时，也锻炼了党员和积极分子，教育了广大同学，使党员们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从1945年秋到1946年秋，党的组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党员的分布面也不断扩大。到1946年暑假后，虽然不少党员毕业离校，但是七所市立中学和钟英中学等私立学校仍有党员。

1946年6月底，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实行恐怖统治。7月中旬，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主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南京各

中学当局也对学生加强控制，党员的活动更为困难。在这个新形势下，学委对中学生党员进行了组织整顿，加强了纪律教育。党员继续以各种形式团结教育同学，积极培养发展对象。

第二阶段，从1946年底到1948年冬，随着整个学生运动的开展，南京中学生党组织在这阶段得到锻炼，斗争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在我军的英勇抗击下，他们吹嘘的“军事上三个月解决问题”的狂妄计划一再失败。为了求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国民党政府又在1946年冬接连同美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和《空中运输协定》，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南京学生运动也不断高涨。在学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市各中学的党支部和党员，广泛团结和教育中学学生，并发动他们参加各种斗争，同大学的学生运动相配合，既壮大了以大学生为主力的学生运动，又使同学们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在这段时间，中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队伍逐步发展壮大。

一、抗议美军暴行

1946年底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后，抗议美军暴行的浪潮席卷全国。南京大、中学生和各阶层群众也纷纷响应，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接连举行罢课、集会、游行示威。在中学里，党员和积极分子们组织时事座谈会，出壁板，发表公正报导和传播进步舆论，揭露国民党的奴才外交，对美蒋口诛笔

伐，有的中学的党员还带领一些同学走进大学校园，参加大学生的一些活动。通过这次运动，同学们大大开阔了眼界，看清了美帝的真面目，并且认识国民党政府是保护美帝利益的，美帝是想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同学们从此对解放区和共产党的各项主张逐渐发生了兴趣。

二、“五·二〇”运动

从1947年“五·二〇”运动到1948年红五月活动的一年里，南京中学生受到深刻的民主革命的影响，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党和积极分子的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进入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驱逐中共代表团，攻临沂、占延安，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已“三鼓而竭”。他们军事上损兵折将，财政上通货膨胀，政治上对高潮迭起的人民民主运动穷于应付。5月份，京沪苏杭16所大专院校学生齐集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镇压，终于酿成“五·二〇”血案。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对各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曾企图玩弄“会考”的手法，把学生逼回到书桌上去。南京中学系统的党组织曾发动全市高中毕业班学生六七百人，冲破阻挠，于5月9日，集体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推迟会考。教育部起先坚持“政令不可改”，但一周以后，顾忌大、中学生两股力量合流，不得不“收回成命”，宣布缓期“会考”。“五·二〇”血案的发生，进一步激起了中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义愤和坚定了同国民党政府作斗争的决心。许多同学流着泪去慰问大学的受伤同学，通过这些活动逐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中学生党员发展较快，到

1947年下半年，所有的市立中学都有了党员，有几个中学相继建立了党支部。

次年5月，在学委的统一部署下，南京学生开展了红五月活动。在纪念“五四”及“五二〇”周年时，举行了两次声势浩大的营火晚会，各中学的党员，发动和带领了许多同学前去参加。这些活动给中学生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增长了他们同国民党政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五·二〇”及其周年纪念晚会的政治口号是鲜明的，斗争场面是激动人心的。在这一年和以后入党的中学生党员，几乎都受到这次运动的教育和影响。

三、三次助学运动

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剧。1947年秋季同春季相比，中学生的学杂费上涨了六七倍，许多家长无力承受。在“五·二〇”以后，学委根据1946年助学运动的经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再开展助学运动，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把斗争引向深入。

1947年8月开展的助学运动是全市大、中学生联合进行的。8月1日，大、中学校的进步力量以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会的名义，召开南京市大、中学生助学筹备会，讨论通过了在暑假中发起助学运动的决议。8月12日，大、中学生助学委员会成立，随后各校成立助学委员会。参加的大、中学校有20多所，学生2000多人。8月30日、31日两天，学生上街义卖，受到广大市民的深切同情，募得的金额超过原定目标。大、中学生助学委按照大学生低于中学生、公校生低于私校生、非清寒

生低于清寒生的原则，对这笔经费作了合理分配，使绝大部分参加助学的中学生得到实惠。

1948年2月学委又布置开展助学运动，这次又有16所大、中学的2000多同学参加。由二女中率先发动，而后各校相继成立助学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市大、中学助学联合会。这次助学形式主要不是沿街劝募，而是以电影、戏剧、歌舞义演和卖报、卖小吃、擦皮鞋等社会服务为主要筹款方式，各校收入，按前述原则自行分配。

1948年暑假，由于国民党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大学方面忙于隐蔽疏散，这时中学党的力量有所加强，因此学委决定这次助学运动由各中学党支部分散发动和组织。虽然这次声势小一些，但仍然有近20所学校的1000多名同学参加，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助学运动始终吸引着广大同学，解决了许多同学的实际困难。助学运动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国民党的口号，但它本身却对青少年学生起了进步思想的教育作用，并由此涌现出大批新的积极分子。随着形势的变化，学委不断调整助学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方法，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公然干预和打击，并在社会上取得广泛的同情和赞助，这种斗争方式确实是团结教育广大同学的好方法。

四、基督教青年会团契活动

1947年春以前，中学生党员大多数在各自的学校或班级里开展活动。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需要有适合中学生特点的跨班、跨校的活动形式。这时，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以“求

真理、善思想、强体格、好集体”为宗旨，倡办少年团契。男中分委就要钟英党支部率先发动成立一批团契，吸引好几个班级的部分同学到青年会活动。随后，各中学的团契也纷纷成立。为了协调行动，按学委布置，成立了团契联合会，之后，又成立了女团契联，在以后的活动中，他们实际上起了“中学联”的作用。

团契不搞轰轰烈烈的运动，它除了用少量的宗教活动（讲圣经、唱赞美诗）作为掩护外，经常组织读书讨论，学习英语，进行音乐、舞蹈、打乒乓等文体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中学生的课外生活，渗透着进步思想，为广大中学生所喜爱。团契在青年会内活动，并没有引起反动派注意，曾有三青团员来刺探情况，也抓不着什么把柄；团契就成了各校党员和同学们经常交往和开展进步活动的一种新的形式。

但在这里开展活动的时间长了，各校党员彼此的政治身份都心照不宣，有的甚至互通了横的关系，这是不符合秘密工作原则的。1948年暑假以后，学委决定团契联暂停活动。同年11月下旬，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总干事、共产党员钱大卫被捕，各校团契和团契联的活动就全部停止。

1948年8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大专学校进步学生进行了两次大逮捕，有情报说，有些中学生也被写进了黑名单，因此，学委在组织大专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撤退时，也组织了一部分暴露的中学生党员疏散隐蔽。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有23名中学生党员分批撤退到苏北、皖中，还有的暂回原籍。有的党员在撤退前发展了新党员，所以全市中学有党员的学校并没有减少。